

試論學術期刊的有為和無為

——兼評新世紀學術期刊改革的得與失

原祖傑

[提 要] 中國自 20 世紀 50 年代建立的學術期刊體系在 70 年代末得以明確和強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學術期刊單位化與期刊編輯職業化。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類綜合性期刊的出版狀況卻讓學界和期刊界很多人憂心如焚。面對外部的批評和內部的窘迫,一批期刊人率先打破歲月靜好的無為狀態,走向有為的期刊改革。從統一註釋標準到明確投稿要求,從推動專欄建設到創辦網絡專業刊,從採用同行評議制度到不斷更新傳播方式,無不展示出投身改革的一批期刊編輯的積極進取精神。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學術期刊無論是編輯制度的完善,還是傳播方式的創新,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改革的邊際效益則似乎越來越低。繁複的制度監督和花樣翻新的傳播競爭造成的內耗和內捲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有為的改革與進取是否應該在某些方面讓位於無為的信任與持守,讓學術期刊回歸到正常的學術服務角色,將改革的目標從強化制度監督調整到培養倫理和誠信機制,以促進中國學術生態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 學術期刊 學術評價 同行評議 編輯角色 學術生態

[中圖分類號] G23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4)04-0116-13

現行中國的期刊體制源於 1950 年代,當時中國開始建構以“審批制—單位制—職業化”為核心的期刊體制,只是由於後來歷次政治運動的衝擊,這一體制變化在 80 年代之前影響不大。然而,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激發了各個行業的奮進意識,也激活了建國初期的很多制度設計。以高校學報為主的學術期刊躍躍欲試,推動教育部於 1978 年 11 月頒發了《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要求高校學報配備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到 80 年代中後期,“有健全的編輯部、有符合本專業要求的專職主編及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已經成為國家新聞出版署指導下學術期刊的標配。“從此,‘單位’正式取代學術共同體成為學術期刊的主辦者,學術期刊則告別了‘編研一體’而正式走向職業化”。^①游離於學術共同體之外的學術期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主體意識,參與其中的主編和編輯們開始積極回應時代的需求,謀劃期刊改革,力圖有所作為。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戰略方針,在積極推進科學現代化、全面繁榮哲學社會科學以及推動中國學術走出去等新政策驅動下,學術期刊的主編和編輯們也受到鼓舞,開始更積極

地由被動轉向主動,由無為轉向有為。劉京希認為學術期刊應該是一種主體性存在,“應當有主格、有品格、有刊格,它應當有自己的學術追求,力圖成為個性化的物質和精神之雙重存在,以完成推進學術事業之繁榮的使命”。^②這一定位也是很多期刊主編和編輯們過去二十年的共識,以至於學術期刊原本自在的角色和無為的狀態幾乎被人們遺忘了。中國學術期刊,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何以發生如此劇烈的角色轉換,這一變化給中國學術發展帶來哪些意料之中或預料之外的後果,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如何盤點、梳理、認知和評價這一時期主要發生在中國人文社科領域的期刊改革,這是本文要討論的核心問題。

一、無為期刊遭遇有為改革

如果從 1665 年世界最早的兩份學術期刊,即法國的《學者雜誌》和英國的《哲學匯刊》創刊開始算起,學術期刊已經走過三個半世紀的歷程。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期刊只是學術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性質、特徵、目標、使命均受制於學術共同體。正常的學術共同體,誠如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的界定,遵循的是一種“隨機秩序”(spontaneous order),“一種自發的、無意識的秩序”。^③波蘭尼對科學共同體的定義應該是基於其對近代早期科學實踐的觀察。有學者注意到,科學革命時期的科學家 and 哲學家們,包括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和稍後的弗朗西斯·培根、勒內·笛卡爾等,都視科學探索為個人志業,只是需要驗證或討論時才通過書信或書籍出版方式與同行分享其發現或見解。一般認為,“科學實踐的個人特徵到 17 世紀因致力於交流科學見解的學會和期刊的出現才大為改觀”。^④對這一轉變的最好詮釋就是 1660 年倫敦皇家學會的建立和 1665 年《哲學匯刊》的創刊。從此以後,學會和作為學會旗艦的會刊就成了學術共同體的核心。學會首任秘書和《哲學匯刊》創辦人亨利·奧爾登伯格(Henry Oldenburg)為鑑定來稿的學術質量還首創了同行評議制度,該制度將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成功地聯繫在一起。從這種意義上說,1665 年之後的歐洲學術共同體也不完全是自發的、無序的,學會和會刊對共同體的引領作用已經顯示出來。

波蘭尼之所以強調學術研究和學術共同體的自發性,所針對的是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國際學術界蔚然成風的計劃學術,而這一趨勢的根源還在於 30 年代大蕭條引起的經濟領域自由放任政策的危機。一方面,遍布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蕭條讓各國領導人和知識精英意識到自由放任帶來的嚴重後果,紛紛求助於凱恩斯主義等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另一方面,受大蕭條衝擊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與在計劃經濟中高歌猛進的社會主義蘇聯形成鮮明對比,在各國知識分子中出現對有組織有計劃的學術研究的熱切期盼。即使以保守主義見長的英國學術界也難以免俗,很多熱衷於公共事務的科學家捲入當時盛行的計劃科學運動。1945 年 12 月,英國科學進步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開會討論計劃科學,並邀請當時已經在科學哲學界嶄露頭角的邁克爾·波蘭尼到會致辭。從匈牙利移民到英國的波蘭尼是計劃學術的堅定反對者,對於英國學界一批服膺於“計劃”學術的科學家很不以為然,但卻在輿論中居於少數。在其致辭中,波蘭尼抱着引發眾怒的勇氣更新了他對計劃學術的批評,“但卻驚奇地發現,發言人和聽眾均支持其觀點,即科學應遵循其內在理路自由地探索”。按照波蘭尼的說法,從那以後計劃學術運動在英國漸趨式微。^⑤

波蘭尼試圖從哲學的高度闡述學術研究的自發性和偶然性,否定計劃學術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但計劃學術不僅存在於 30 年代蘇聯的“五年計劃”之中,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也由於眾多研究基金的設立而將原來的個人研究納入到不同程度的集體研究之中,這種團體合作體現在學術發表

上就是聯署作者的普遍化,說明大多數涉及實驗、統計和調查類發現都是由一個團隊而不是個人完成的。^⑥與科學革命時期單打獨鬥的獨立作者發表不同的是,19世紀末以來團隊成果的逐漸增多。對此我們只要瀏覽一下一些著名科學雜誌的文章目錄即可一目了然。

儘管歐美等學術強國依然在追求自由自在的學術研究,但在現實生活中,不受外界干預和影響的純粹學術幾乎是不存在的,就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倡導的自由放任理論從未完全實現一樣。更何況,在一些傳統社會中,“為解決複雜且不確定的環境問題而向國家提供科學諮詢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⑦對於當下世界各國的學術期刊來說,無論學術界是否情願,都不得不承認,它已經難以避免地為各種外在力量所驅動,成為從大學到國家的行政機構對學者進行學術評價的工具了。根據朱劍的觀察,這種以學術評價為目標的對學術生態的外來干預主要起因於二戰之後的冷戰狀態:“國家對於科研的巨大投入成為戰後科研資金的主要來源,科研資金則成為大學及研究機構全力以赴爭奪的對象”,為了公平分配科研基金,“專業評價機構應運而生”。^⑧學術期刊作為學術發表的重要平台,自然也被納入評價體系之中。越來越多的外來干預,讓學術期刊背離了自然、自在、自發的原始狀態,由無為走向有為。

具體到中國國內的學術期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變化。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讓中國迎來了80年代的科學春天。然而,由於研究人員的數量有限,高質量的學術成果相對較少,學術發表基本上還是遵循傳統的自由自在的方式,學術之外的干預因素並不多。儘管國家從1991年就開始設立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學術研究,但早期的資助數量相對較少,並未對大多數人的學術研究產生影響。在很多資深編輯的回憶中,八九十年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無論是科研還是編輯工作都要從容得多。學者們沒有今天這樣大的發表壓力,也就沒有因僧多粥少造成的內捲。這種歲月靜好的局面甚至掩蓋了中國學術期刊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生存狀態。到上世紀末,中國學術期刊,尤其是綜合性學術期刊存在的各種問題開始顯現。朱劍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透露,上世紀末的1998年,國家新聞出版署本來要整頓綜合刊過多的亂象,結果“一個不經意的疏忽導致了治理整頓的結果與初衷大相逕庭,以致形成了如今一校一刊、一盤散沙般的學報尾大不掉的尷尬局面”。^⑨這樣,隨着中國學術的崛起和知識產出的增多,綜合性大學學報遍地開花。從90年代中期開始的十年間,“文科學報總數翻了一番多,達到了1,300餘家”。^⑩當學術界和期刊界逐漸認識到千刊一面的綜合性大學學報不能代表學術期刊發展的正常方向時,中國的期刊困境已經積重難返。

既然學術界期望的期刊專業化發展在傳統的紙質刊出版上已經無能為力,期刊改革的目標指向了世紀初在中國方興未艾的網絡化出版。在朱劍、仲偉民等學報主編的組織和策劃下,2012年以教育部名刊為主的17家學報在知網共同推出了《馬克思主義學報》、《歷史學報》、《文學學報》、《哲學學報》、《政治學報》等10種網絡專業刊。這個被稱為“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的網絡出版系統參與的學報後來增加到上百家,專業刊的數量也增加到數十種。這一設計的目標就是通過網絡媒體實現綜合性學報專業化呈現,所針對的是中國綜合性學報的拼盤化現象,所追求的是學術期刊的專業化發展,所依託的是正在興起的數字化、網絡化閱讀趨勢。與國家指導的各項改革不同,這一期刊改革舉措完全是由學術期刊自己發起的。過去三十年中國期刊發展經歷了光盤版、網絡版、微信公眾號版等多個發展階段。期刊界在增加和改進傳播渠道上的有為主義(activism)經常需要與信息化傳播日新月異的發展速度賽跑。科技的不斷進步導致人們行為方式的改變,數字化改變了很多讀者的閱讀習慣,促使期刊不斷追求新的傳播方式。雖然由於後來網絡化由呈現到搜索的轉向讓網絡專業刊的努力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這一嘗試仍不失為中國期刊改革的一大壯舉,

在中國期刊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除了綜合刊過多這一痼疾之外，中國學術期刊也受到本世紀初學術繁榮中滋長的學術腐敗和學術不端的侵蝕。一位學報編輯曾在文章中對當時中國學術期刊的文化生態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學術共同體生態失衡”殃及學術期刊，“使得一部分學術期刊在‘真學術’面前抬不起頭，它們缺乏學術公正與學術尊嚴，學術質量平庸，假冒偽劣的學術泡沫和垃圾充斥着期刊，佔據着大量的學術版面，這種狀況讓有良知的編輯痛心疾首”。^⑪

可以說，世紀之交工作在高校學報的一批期刊編輯是最先感知到學術生態變化的學術群體。進入新世紀，尤其是在中國加入 WTO 以後，一方面是經濟的迅速繁榮，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經費逐年增加，研究隊伍不斷擴充，學術產出也成倍增長；另一方面，各行各業都在尋求與世界接軌，學術研究和知識生產也在走向國際化，學術期刊為了追求高質量發展也必須有所作為，開始積極探索各種改革路徑。激勵期刊界銳意創新大膽改革的是教育部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一系列舉措，其中影響最著的當屬 2003 年底正式啟動的“名刊工程”。從 2003 年底到 2011 年 5 月，該工程在全國一千多種高校人文社科期刊中前後分三批遴選出 31 種高校名刊，通過樹立典型以點帶面推動學術期刊整體質量的提升，以改變大學學報“全、散、小、弱”的狀況，實現“專、特、大、強”的目標。

對於期刊界來說，要跟上市場的改革步伐，首先要解決的是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在朱劍 2007 年刊發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文章《徘徊於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中得到了較為全面的闡述。經過幾年的醞釀，一批率先成為教育部名刊的大學學報開始推動積極有為的改革。仲偉民、朱劍 2012 年在《清華大學學報》上刊文，提出要擺脫“1950 年代以來逐步固化的綜合性、內向性模式”，構建科學合理的學報體系。^⑫期刊改革的路徑在張耀銘的幾篇重頭文章中得到系統闡述，即要擺脫中國學術期刊“全、散、小、弱”的狀況，從千刊一面的局面中脫穎而出，就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提升自身的品牌影響力，具體包括（1）提升選題策劃能力，（2）建立特色欄目，（3）加強專題研究，（4）推出名家名文，以及（5）開展學術爭鳴，等等。^⑬這些改革有一個總體目標，就是張耀銘總結的“重建學術期刊的公信力和權威性”：首先要剔除製作假刊、濫發增刊和買賣版面等以刊牟利的現象；其次要擺脫平庸，改頭換面，所發文章從內容到註釋格式都要遵循嚴格的學術標準；第三，通過採用同行匿名評審制度等形式提高稿件錄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並讓學術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第四，通過社科資助等方式鼓勵期刊推動學術創新，引領學術潮流。張耀銘還舉出《文史哲》圍繞重大學術問題舉辦學術會議、《南京大學學報》倡導“專欄特約主持人”制度以及《清華大學學報》設立“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等案例，說明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為改進期刊質量、推動學術進步做出的諸多努力。^⑭改革的齒輪在尋求有所作為的各家學報編輯部的推動下轉動起來。朱劍在近期發表的文章中追溯了期刊改革中兩個著名的話題，即“編輯學者化”和“編輯引領學術”的來龍去脈：“要說兩者是怎樣走到一起的，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不管大刊小刊名刊普刊，編輯們都不甘現狀，積極勵志，勇於突破自我使然。”^⑮

二、從案頭編輯到策劃、約稿編輯——編輯角色的演化

學術期刊要有所作為，首先要求期刊編輯轉變角色，承擔起新的責任和使命。而 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期刊體制改革造就的期刊編輯職業化為中國期刊人命運的變幻起伏埋下了伏筆。根據朱劍的研究，從 1980 年代開始，隨着“學術期刊特別是高校學報數量的激增”，“作為一個獨立行業的學術期刊（學報）職業編輯隊伍也迅速壯大”。“當脫離了學術研究和從未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的職業

編輯成為編輯主體之時，他們已不再具有學術共同體成員的身份”。“顯然，制度層面的職業化改變了編輯與學者的傳統關係，對‘編研一體’傳統的否定直接導致了學術期刊編輯全面退出了學術研究領域而與學術共同體分離”。^⑥職業化重新規定了學術期刊編輯的責任與使命，也重新塑造了編輯的知識結構：首先，單位認同取代了學術共同體認同。既然期刊是由單位主辦，主編和編輯也都由單位任命，他們當然要對單位負責。其次，編輯代替學者掌控了學術成果的評判權。誠如朱劍所見，“通過體制的賦權，編輯可以憑藉審稿來支配甚至指揮學者的學術研究”。^⑦最後，以高校學報為主的綜合性期刊的多學科特徵決定了人數有限的期刊編輯不可能追求專家化發展，而必須應對來自不同學科的知識挑戰，變成了“雜家”，也就是劉石所認同的“編輯應該是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並認為“一流學者的文章恐怕也只能由具有二流乃至三流學術水平的編輯來編發”才是合理的。^⑧從八九十年代過來人的各種回憶看，大部分期刊編輯對於 70 年代末開始的編輯職業化是樂於接受的。相對於一線教師和科研人員，期刊編輯的工作壓力要小一些，卻又能在很多學術會議上受到“尊寵和禮遇”。^⑨如果能在身上下接受這種體制安排，期刊編輯應該是個令人羨慕的職業，這或許就是很多資深編輯回憶中那段雲淡風輕的美好時光。

傳統意義上的期刊編輯是案頭編輯，每天拆閱和反饋一封封紙質郵件，從中選出優秀的文稿發表，大多比較清靜無為，雖然也有較為繁忙的大刊編輯，但案牘勞形總能在大小學者們由衷的謝語中得到慰藉。他們秉持的是內容為王的辦刊宗旨，所關注的也主要是論文質量，而不必考慮其影響因子、轉載轉引或者獲獎評優，更不用為期刊分級和基金資助費心勞神。那時的期刊編輯大多意識不到其職業可能帶來的權力和利益，也就不會看重任何非正常的回報。根據曾供職於武漢大學學報多年的葉娟麗教授的回憶，近十年來退休的那批編輯，多數是在 1980 年代轉崗而來。“這批編輯主導了中國學術期刊發展的黃金 30 年，並且確立了中國學術期刊發展的一些基本規則，其中之一就是恪守專職編輯本分，不介入學術，做純技術性的編輯”。^⑩作為職業編輯，他們所能獲得的最大獎賞就是一代又一代學術新人都會記住他們第一篇重要文章是誰編的。筆者 1988 年碩士畢業留校工作，1990 年在《世界歷史》發表了第一篇代表作，至今記得編輯部黃啟芳老師覆信中的溫文爾雅。如今黃老師已去世多年，很多學術同行還時常談起她，銘記着她的恩澤。對一位“甘為他人作嫁衣”的職業編輯來說，能為廣大作者所銘記，能活在作者心中，也不失為一種理想的境界。只是時過境遷，即使期刊編輯們沒忘初心，也回不到當年的工作環境了，現在的學術生態和辦刊條件已今非昔比。

對很多期刊編輯來說，最值得懷念的還是沒有所謂核心期刊、沒有期刊排名的那些年的恬淡與溫馨。曾在一家大學學報工作數十年之久的陳穎對於核心期刊排行榜在中國的登堂入室及其造成的期刊惡性競爭有深切的體會：“隨着一些圖書情報機構的有意誘導、持續加溫，加上高校、科研院所等學術單位科研管理部門的有意無意配合，所謂核心期刊排行榜竟逐漸流行開來，經過二三十年的浸潤，如今已堂而皇之成為幾乎所有高校和科研單位考核學者學術水平科研業績的不可或缺的主要指標之一。對於學術期刊而言，這幾乎是一個看不見的巨大天網，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所謂核心期刊評價都如影隨形難以掙脫。於是，為了在所謂核心期刊排行榜中掙得一席之地，眾多學術期刊不得不認真對待主動迎合諸如影響因子、被引率、下載頻次等評價指標，久而久之竟相沿成習，溫水煮青蛙般淪為期刊評價機構的‘奴隸’”。^⑪表面上看學術期刊越來越受重視，期刊編輯地位也水漲船高、炙手可熱；而實際上，原來很多與世無爭的編輯現在卻被捲入各種權力角逐中，一方面要應付超越學術的各種要求和請託，另一方面又要為自己供職的期刊爭取到“核心”的地位和可觀的名

次,為此不得不主動出擊,利用各種機會約請名家稿件以提高轉引率,勾兌二次文摘編輯以提高轉載率,利用多媒體增加所刊文章的能見度和傳播範圍。這就導致編輯角色發生根本變化,由案頭編輯、文字編輯轉化為策劃編輯、約稿編輯和多媒體編輯。

從過去二十多年學術期刊的發展趨勢來看,無論是學術繁榮還是傳播技術改進都對主編和編輯形成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期刊編輯被職業化並逐漸疏離於學術共同體的八九十年代,學者隊伍和學術產出都保持在有限的規模。就筆者所熟悉的歷史學領域而言,很多資深教授一輩子正式發表的文章也不過十來篇;有的教授雖然學富五車卻不著一字。相比之下,學術期刊編輯少發甚至不發文章也不會有什麼壓力。大概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的學術發表就駛入快車道,經過一二十年的積累,學界出現了很多著作等身的學者,發表的文章動輒上百篇,甚至數百篇。這種現象加重了編輯的身份焦慮:如果不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可觀的發表,自己還算不算一位學者?在對於學術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已成共識的當今中國,期刊編輯如果不能自動學者化,就要付出比學者更多的努力去證明自己。由此我們看到很多編輯在承擔了繁重的編校工作的同時,還要抽出時間做科研,不然的話職稱就難以晉升,待遇上也與教學科研崗拉開了更大的距離。

學術期刊編輯面臨的另外一重壓力是數字化帶來的挑戰。中國學術期刊由無為向有為轉變時期,正趕上學術傳播的網絡化、數字化革命。追求學術傳播的方便、快捷成為很多期刊的辦刊目標,自然也成為加諸編輯崗位的新要求。張耀銘十多年前就曾撰文談“數字挑戰與編輯重塑”問題。他指出:“面對數字化的挑戰,學術期刊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學會數字化生存。學術期刊的編輯不僅要了解不斷湧現的各種新技術,如期刊採編系統、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電子排版系統、電子校對技術、數字化出版技術、手機出版、RSS訂閱、博客等,積極將新技術應用於期刊出版中,而且必須轉換自己的角色定位。”^②關於角色轉換,張耀銘談到的兩點變化至今依然困擾着學術期刊的主編和編輯們:其一是“由單純的文字編輯轉型為全媒體編輯”。隨着信息化革命向縱深發展,對學術信息的傳播要求越來越高。期刊編輯要想跟上信息革命的技術進步,不僅要熟悉網頁的設計與操作,還要了解移動互聯網技術。其二是“由學者型主編轉型為職業化主編”。他認為,將主編工作僅僅看作學術科研之外的一份兼職是不夠的。身為主編就應該投入其中,使所辦刊物“體現出一種整體的編輯思路、學術導向和審美情趣”。^③張文提到的主編職業化與前文所談編輯學者化看似矛盾的兩個方向,卻形成相向而行的雙重壓力,讓學術期刊編輯們告別了雲淡風輕的案頭生涯,既要在各自領域的科研工作中站穩腳跟,又要成為新媒體能手和社交達人,讓所編輯的期刊在正常的學術影響和不正常的學術分級與排名中都能立於不敗之地。

三、學術期刊的責任與使命

可以說,至晚到本世紀初,學術期刊角色定位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被動服務於學術共同體,逐漸轉變為具有主體意識的獨立學術平台,以推動學術進步與發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劑自任。期刊職能變化的背後是主編和編輯職責的變化,從過去“為人做嫁”的服務型工作轉變為學術研究隱形的指導和指揮者。只要瀏覽一下過去二十多年發表的有關學術期刊使命的文章,不難發現充斥其中的各種高大上的口號,很多期刊往往在政治高調中忘記了自身的基本定位,那就是作為學術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期刊在推動學術共同體建設和中國學術繁榮中究竟要承擔起什麼樣的使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客觀地說,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的發表、展示和交流平台,經常不自覺地成為學術活動的中

心。歷史上不乏作為某個學術團體的旗艦雜誌引領學術新潮流的案例,如催生年鑑學派的創刊於1929年的《經濟社會史年鑑》(1946年改名為《經濟、社會、文化年鑑》),還有中國近代史上圍繞《學衡》雜誌形成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學衡派,圍繞《食貨》雜誌形成的食貨學派,都是因期刊而得名。然而,很多學者在關注期刊與學派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二者之間固有的本末與因果關係。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歷史上一些學術流派的形成過程,就會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先有一批擁有某種創新性學術思想和方法的學者,為了表達他們的觀點才創辦一份學術期刊或者其他形式的學術媒體。近代思想史上較早出現的學派是法國的百科全書學派(Encyclopédiste)。這個學派雖然以狄德羅等人編著的《百科全書》(全稱《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詞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命名,但了解其歷史背景的學者都清楚,在主編《百科全書》之前,狄德羅就與一些志同道合的啟蒙思想家結成一個圈子,成員包括孟德斯鳩、魁奈、伏爾泰、盧梭、達朗貝爾等,他們都參與了《百科全書》的編纂。後來的年鑑學派的情況也大抵如此。根據彼得·伯克的研究,年鑑學派的創立者是兩個人,費夫爾和布洛赫。二人都出身巴黎高等師範學校,1920年同時被任命為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從此開始了長達13年的不間斷的合作。辦公室相鄰的費夫爾和布洛赫每天都一起討論他們感興趣的歷史地理和社會心理等問題,間或有別的學科的同事加入其中,逐漸形成一套全新的歷史研究視角和方法。1929年他們共同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並以此為平台帶動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歷史學家投身其中。儘管期刊名稱後來兩度變更,但學派的特色具有明顯的一致性。²⁴由此可見,我們可以說年鑑學派以《經濟社會史年鑑》這份期刊而得名,但期刊只是學術群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學派與學刊之間的因果關係也體現在上文中提及的近代中國的兩個案例身上,無論是《學衡》派還是《食貨》派,都是先有一批在思想、方法上尋求創新或者異於常人的學者,才有期刊和學派。當然,釐清學術期刊與其所依託的學術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並不是要否定期刊在推動學術發展中可以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其實,回顧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科學期刊的巨大變化,不難看出學術期刊編輯,尤其是高校學報編輯們銳意進取、不斷創新以引領學術的心路歷程。在積極有為的心態下,引領學術的很多路徑被開拓出來。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通過策劃和組織重點欄目,推動期刊特色化發展。重視欄目設置,以欄目體現特色,是過去二十年期刊界的普遍做法,也是很多綜合刊克服拼盤化弊端的有效舉措,受到廣大讀者的讚賞。通過重點欄目的設置可以實現如下辦刊目標:其一是貫徹國家大政方針,達到主題宣傳的目的。高自龍總結了新時代學術期刊創新引領的五個視域,包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與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中國化轉化以及中華文化、中國理論的世界化轉化。²⁵這五個方面也是很多期刊欄目設置的重點考慮。其二是關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支持國家人文社科研究規劃。二戰後從部分西方國家開始通過國家和各種基金會資助對學術研究提供支持,進而影響學術研究方向。20世紀80年代中國也開啟了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進入新世紀以後對人文社科研究支持力度也開始加大。很多學術期刊都會對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支持項目成果更為重視,其實也是變相支持國家導向的學術研究。其三是關注國際國內學術研究新視角、新方法、新問題,推動學術前沿的不斷開拓。如果說前兩種情況期刊編輯只是讓所編期刊被動地服務於國家大政方針和學術導向的話,第三種情況則要求編輯側身學術活動,把握學術動態,對國際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術前沿有足夠的了解,亦或通過各種學緣聯繫到具有國際視野或前

沿經歷的學者出面主持專欄,如《澳門理工學報》近年來開設的“動物研究專題”即屬此類。也許還有第四種情況,儘管並不像前三種情況一樣被各家期刊普遍採用,但卻成為很多原來名不見經傳的期刊異軍突起的強項,那就是藉助辦刊機構和辦刊環境的特殊性而開設的特色欄目,如《澳門理工學報》長期設立的“港澳研究”和“中西文化”等。

需要指出的是,專題的突出、專欄的開設也應該把握好度,要給專題之外的研究留出足夠的空間。很多期刊的版面都被各種各樣的專欄佔據,而很多專欄的稿件來自約稿,無法納入專欄的稿件發表往往會被推遲甚至拒絕。長此以往必然會破壞自由自發的學術生態,不利於學術共同體的健康成長。

二是要通過期刊制定的學術標準和寫作規範,引領學術發表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回望歷史,中國學術現代化道路是經歷了艱難曲折的,從晚清以來孕育發展起來的現代學術研究由於革命和戰爭的衝擊而屢屢中斷。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為了全面更新中國的學術標準和規範而積極尋求與世界接軌。就人文社科成果的發表來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很多期刊和出版單位還不重視標準化生產,編排體例和註釋格式五花八門,不規範現象比比皆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學術期刊率先在學術發表上引領了一條標準化、規範化的道路,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推出關於引文註釋格式的規定,同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編排規範研討會”,修訂了《綜合性期刊文獻引證技術規範》,後來陸續被高校學報等綜合性期刊採用,並帶動了很多高校學位論文註釋格式的改進,對於年輕學者良好學術習慣的養成起到指導作用。除了註釋格式之外,幾家名刊學報還率先要求作者投稿要有相關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很多期刊也整頓了原來不甚地道的摘要寫法,讓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寫作更為規範合理。

三是做好學術守門員,既不讓好稿件從自己手中溜掉,也不讓學術含金量不夠的稿件以次充好,更不能讓存在學術不端的稿件在自己手中蒙混過關。為減少和杜絕學術不端現象,中國知網從2008年開始正式推出“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成為學術守門員手中的利器。藉助知網等檢測平台,文科學術期刊率先發起對學術不端的檢測,從而減少了投稿中的抄襲、剽竊、偽造、篡改等不端問題。學術不端是一個全球現象,但毋庸諱言的是在中國學術界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作為學術發表主要平台的學術期刊自然成了學術腐敗和不端的重災區之一。各界對學術不端的關注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也就是量化評價逐漸進入學術管理機構的視野、職稱評審開始與論文發表密切掛鉤以及全國的學術產出開始騰飛的時代。學術躍進和繁榮雖然催生了一大批優秀成果,也導致了學術發表上的泥沙俱下。有學者注意到,“從1997年到2017年,幾乎每年都有學術不端案例被媒體曝光”,“尤其是近年來頻繁發生的國外出版機構撤稿事件,嚴重損害了我國學術界的形象,甚至對國家科技創新、學術繁榮乃至國際形象都造成了消極影響”。^⑤由此可見,學術期刊對學術論文發表的把關作用關乎國家形象和學界顏面,也為論者所特別關注:“我國作為世界第二期刊大國,目前共出版各類學術期刊6,000多種,所提供的版面每年可刊登數百萬篇論文,但依然無法滿足論文發表的需求,核心期刊更是炙手可熱。‘唯論文’評價機制導致的學術腐敗不勝枚舉,還催生了大量的論文中介、論文槍手,加劇了學術界的亂象。”^⑥對於屢禁不止的學術不端現象,教育部、科技部等中央部門三令五申地加以治理,各高校和科研機構也加強了懲治力度,應該說收效還是非常顯著的。中央各部頒發的懲治條例,為期刊進行學術把關、當好學術守門員提供了可靠依據。

四、學術期刊與學術評價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期刊跌宕起伏的命運和有為無為的取舍總是與學術評價糾結在一起,

無論是作為篩選作者投稿、決定學術發表的評價主體，還是被收錄、轉引、轉載的評價客體，期刊都深陷當今中國已泛濫成災的學術評價的漩渦。期刊評價一般認為始於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1955年加菲爾德在《科學》雜誌發文提出了“引文索引”的設想，目的是為科學家提供感興趣的文獻索引，以便於科學家及時了解本領域的科學發表。1960年他創辦了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並以此為基地，在1963年建立了科學索引(SCI)數據庫，隨後又建立了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與人文索引(A&HCI)數據庫。無論加菲爾德當年的初衷如何，這幾個索引系統後來都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查閱和評價論文影響力的依據。SCI系統作為一種衡量標準從上世紀末引入中國後，馬上受到各個科研機構學術管理部門的廣泛青睞，成為高校評估和管理科研任務的重要參考。2000年南京大學社會科學評價中心成立以後，中文學術界便有了自己的索引系統CSSCI，從此C刊成為期刊的標準身份，也是期刊編輯部和廣大作者追求的基本目標，很多高校規定C刊之外的論文發表不計入工作量，這就鑄就了中國學術界特有的C刊現象：一方面，各家人文社科類期刊為被南京社科評價中心收錄為C刊而進行着各種形式的數據比拼，有的期刊為此甚至不惜數據造假；另一方面，由於很多高校和科研機構在統計科研成果時只認C刊(有的又在C刊之內再分更高層次的A刊和B刊)，作者在投稿時自然會瞄準C刊，使數量相對有限的C刊成為學術發表的緊缺資源。由C刊引發的焦慮像幽靈一樣在各大高校和科研機構徘徊：首先，C刊是博士研究生按期畢業走上科研道路的敲門磚，在讀期間至少發表1篇C刊依然是大多數高校取得博士學位的基本要求；其次，青年教師職稱晉升如無C刊發表(直接採用SCI標準的學科除外)基本不可能入圍；最後，那些已經獲得高級職稱的資深教師和科研人員似乎發表要相對容易一些了，但又不能不為其所培養的碩、博士研究生順利畢業而陷入新一輪的焦慮。C刊焦慮像陰霾一樣籠罩着為學術內捲所苦的各大高校。即使在中央各部委聯合反“五唯”的今天，這一現象都未曾動搖過。人們將批評的矛頭既指向他們熟悉的各家C刊，也指向製造了C刊的以南大社科評價中心為代表的評價機構，似乎是期刊和評價機構聯合製造了C刊現象。更為清醒的批評者則看到了掌握指揮棒的科研和教學管理部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凌駕於科研之上的行政權力的亂作為。仲偉民對學術評價亂象總結說：“中國學術評價機制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急功近利以及學術大躍進，造成科研行政管理部門過多干預學術，在學術管理上甚至亂作為。社會上各種各樣的大學排名、學科排名以及五花八門的課題申請及評獎活動等，更是將這種不合理的評價機制推向極致。”^③

如何看待學術界對包括學術期刊在內的各種學術評價的尖銳批評？首先還是要以理性的眼光和客觀的態度判斷一下以量化評價為主的學術評價是否合理。很多人在對當今社會的過度評價的批評中流露出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學術生態的懷念，那時SCI的影響還未波及到人文社科領域，學術評價主要靠口碑。但那樣的“學術環境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可遇而不可求，即使其中也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卻能在人們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④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中國學術體量已經翻了幾倍，自然難以沿用過去的管理方式。SCI之所以能在中國大行其道，C刊之所以能成為從中央到地方揮之不去的社會現象，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曾在南大社科評價中心工作多年的沈固朝在談及引文索引與學術評價關係時指出：“引文索引數據用作評價工具的原因主要有：1. 定性評價的主觀性、非共識性、耗時性及某些難以避免的人為因素干預；2. 以論文數量代替成果質量的趨向；3. 引文索引在總體上客觀地反映出科研成果的繼承與發展關係；4. 期刊影響因子以期刊論文在學術界的反響、影響為依據，在一定程度上較客觀地反映了期刊的質量；5. 廣泛大樣本的統計

分析數據保證了對來源期刊評價的客觀性和公正性。”^③這裡道出了一個客觀現實，就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的蓬勃發展和海量產出讓原來的定性評價難以實施，以影響因子為主要依據的量化評價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然而，這種不得已又不能不面對另一個現實，也就是仲偉民所警示的“量化評價扼殺人文學術”：“目前的學術評價機制不僅使人文學科處於極其不利的處境，主要刊登人文學科論文的社科學術期刊也同樣陷入困境。”他比較了同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兩份權威期刊《歷史研究》和《經濟研究》。根據2014年發布的影響因子年報，後者的複合影響因子達到9.831，而前者還不到1，只有0.954。^④人文學科的學科特點和從事人文研究學者的寫作習慣導致人文類文章轉引率和影響因子過低現象不僅拉低了以人文類見長的學術期刊的各項數據指標，讓一些綜合類期刊直接取消了歷史、文學等人文類欄目，也影響到人文類專業刊的在各類期刊分級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到廣大人文類學者的職稱晉升和崗位評級，長此以往必然威脅到整個人文學術的生存狀態。當然，面對學術界的尖銳批評，評價機構也在不斷改進其評價體系，力圖“將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以同行專家定性評價為主導”，“將共性評價與個性評價相結合”，“依據學科屬性，將期刊分為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綜合期刊和冷門絕學四大類”，通過細化學科分類解決量化評價中存在的問題。^⑤

為了爭取客觀、公正的學術評價，過去二十年學界和期刊界做出的一個共同努力就是推動學術評價回歸學術共同體。對於學術期刊來說，回歸學術共同體的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在選文機制上加入同行評議，即雙向匿名同行評議(double-blind peer review)，讓學者參與到期刊的審稿流程，與期刊編輯一起當好學術守門員。根據張耀銘的回憶，中國學術期刊匿名評審制度的逐步實行主要是本世紀初的事。他寫道，“2002年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的意見》，提出‘有條件的學報可以逐步實行同行專家的雙向匿名審稿制度’，同行評議在我國高校學報界開始得到廣泛推廣”。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同行評議已經成為期刊界的“新常態”。^⑥

對於學術期刊來說，雙向匿名同行評議的採用具有無為和有為雙重含義。將原來由期刊編輯單方面決定的稿件審查和採用權力全部或部分地交到同行專家學者手中，也就是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共同體，意味着讓學術期刊回到一定程度的無為狀態；而對於歷史上缺少同行評議傳統的中國學術期刊來說，採用匿名審稿制這一舉措本身又是一場具有自我革命意義的有為改革，不僅在用稿機制上實現了“看得見的公平”，還產生了一定的外延性的制約作用，包括對行政權力、對評價機構和對商業資本的多重制約。^⑦

同行評議制度經常被溯源到最早的學術期刊《哲學匯刊》主編奧爾登伯格經常將匯刊的來稿寄給皇家學會相關成員鑑定的做法，到19世紀才被歐美國家的學術期刊廣泛採用。對於沒有將學術期刊公開分級的歐美各國，是不是同行評議期刊是高校或科研機構鑑別是不是正規學術發表的主要標準。同行評議的積極作用在學界已經得到公認。一位英國權威期刊主編曾經評論說：“我在同行評議中看到四個目標：選取應發內容，改進要發內容，發現錯誤，發現造假。”同時他也對同行評議存在的問題了然於胸：“用同行評議提前篩選的問題在於其低效、緩慢、昂貴、歧視、不專業、抑制創新以及易被濫用，即將重要的當作次要的篩除。”^⑧這些問題在對同行評議制度的批評中被反覆提及，其中中外學術界有共識的幾點包括評審效率低、評審周期長和評審意見不專業、不公正等，成為評審制度改革的重點。進入新世紀以來全世界科學發表井噴式的增長讓很多學術期刊面臨尋找合適的評審人的壓力，而即便那些視學術評審為共同體義務的熱心學者也難以應付經常收到的評審任務，編輯們往往幾經周折才能找到合適的評審人，中間自然耗費了不少時間。如果評審

人因為工作繁忙而推遲甚至忘記評審任務，反饋的時間會再次延遲，評審周期就是在這樣的周折中被一再打破、反覆延長，而很多期刊面對這樣的問題卻束手無策，找不到有效的解決辦法。

相對於評審時間和效率方面的問題，很多評審意見所表現出的尖酸刻薄也是編輯們深感頭痛的問題。有學者注意到，通常認為審稿人評論的是數據、論證方式和研究方法，然而有的審稿人卻毫不掩飾地貶低作者的研究能力，甚至達到人身攻擊的程度。在筆者主編英文刊《中國歷史學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間，經常會有編輯反映收到的評審意見過於尖刻，每次我都會建議編輯反饋給作者時要刪掉一些刻薄的話，如果能用正常的語言把意見表述清楚，為什麼非要用難聽的話去刺激作者？前者的評審人主要是美、英等國的海外專家，後者則主要來自國內。也就是說，這樣的現象不只存在於以中國學者為主的學術共同體中。針對這一問題，eLife等國際著名科學期刊曾嘗試改革同行評議中的一些規則，如公開評審意見，即開放式同行評議(Open Peer Review)。但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讓期刊更難找到合適的評審人，因為“開放式同行評議往往要求審稿人公開身份，對這一點大部分審稿人都不能接受”。^⑧過去二十年來，對同行評議制度做出的改革嘗試大多歸於失敗，讓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之間陷於一種頗為尷尬的關係。從對同行評議制度的各種批評來看，該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參與評審的同行專家學者履責過程中未能恪守學術倫理標準的問題。

因此，當我們呼籲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的時候，就要面對這樣的問題：被寄予厚望的中國學術共同體能否承擔起學術評價的重擔？李劍鳴在一篇討論學術評價的文章中，將“權力支配、人情主導，標準缺失”認為損害學術評價的三種主要因素。但對於有人提出的“把學術評價交給學術共同體”卻心存疑慮。他追問說：“我們現在有真正的學術共同體嗎？”、“上面說到的‘人情’和標準問題，難道不就是發生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嗎？”由此可見，要解決學術評價中的人情泛濫和標準缺失問題，重要的是建立學術共同體的自治與自律(autonomy)，包括“制定學術規範，建立學術標準，形成學術倫理準則”。^⑨筆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美國大學教授協會職業倫理聲明》中的規定強調說，“深信知識進步的價值與尊嚴的教授，知道他所肩負的特殊責任。他對他所屬學科的基本責任就是尋求並如實陳述他所發現的事實。為此目的他要致力於發展和提升他的學術能力。在使用、拓展和傳播知識時，他承擔著運用嚴格的自律和判斷的責任。他要履行學術誠信”；“要徹底糾正學風和學術不端問題，改善學術生態環境，還是需要從學術誠信和學術倫理建設入手，明確需要承擔責任的機構和團體，補上缺位環節，嚴格懲戒措施”。^⑩而對於學術期刊和學術共同體來說，要想有所作為，就需要參照歐美國家的職業團體傳統，制定行業標準，發揮行業學會作用，通過准入機制和懲戒措施鼓勵對共同體的貢獻，抑制同行之間因不正當競爭造成的內捲和內耗，通過黑名單等追責措施懲治學術不端和有違學術誠信與倫理的行為。總之，儘管同行評議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依然是學術評價中最為理性可靠的制度。對於採用同行評議時間不長的中國學術界來說，更不能因噎廢食，因為學術共同體的不健全就否定同行評議的作用。

結語

《莊子·大宗師》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如果在英國的牛津、劍橋等老牌高校住上幾個月，就會發現投身學術不一定總要不捨晝夜地汲汲以求，也可以如劉禹錫《陋室銘》中所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在恬淡自在中“調素琴，閱金經”。科學研究的正常、自然狀態本可以是一種“隨機秩序”，學者們通過自發

的努力和相互交流完成科學發現。而學術期刊的發展也應該遵從科學革命以來那種近乎老莊哲學的“無為無治”狀態,學術期刊編輯們也可在令人愉悅的學術交流中作逍遙遊。然而,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的學術期刊編輯們身處學術井噴中泥沙俱下的大環境中,正常的學術研究剛剛恢復卻發現已經落伍,而學術期刊則因為綜合刊數量的劇增導致整體質量下滑,以致很多期刊淪為學術垃圾場。在這種情況下,學術期刊編輯們不得不走出逍遙狀態,從無為轉向有為,推動從欄目設置到註釋格式、從文字編輯到全能編輯的各項改革,不僅讓中國學術期刊的整體質量獲得全面提升,也大大推動了中國的學術創新和學術繁榮。與此同時,期刊編輯自身的定位和角色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從當年的案頭編輯轉化為今天的策劃編輯、約稿編輯;從文字編輯修煉成無所不能的多媒體編輯。他們不再甘於平庸,卻不自覺地陷於無休止的內捲;他們在時代變革的大潮中勇敢地接受自我革命,卻也可能在激進的洪流中迷失自我。反思過去二十多年的期刊改革,我們在為取得巨大成就而驕傲的同時,也不能不為一切以工具理性為導向的現代化發展而擔憂。能否把握好有為與無為之間的平衡,在銳意改革的同時又能不忘初心,小到一份期刊的質量和聲譽,大到整個學術生態的維持,都是十分重要的。客觀地說,過去二三十年中國學術期刊改革成就主要在於編輯制度的完善和傳播方式的創新兩個方面,如今這兩個方面均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改革的邊際效益則似乎越來越低。要從有為轉向無為,改革的目標就應該從強化制度監督轉向培養倫理和誠信機制,包括加強全社會的誠信與倫理教育,加強職業倫理規訓,發揮好具有從業資格要求的各種學者團體以及期刊界的期刊協會或學報研究會這樣一些職業學會的作用,制定出比較一致的學術誠信和學術倫理標準,並以誠信、信任和尊重為原則履行這些標準,從而減少或消除內捲和內耗,促進中國學術生態的健康發展。

①⑪朱劍:《編輯學者化:何以討論了三十年》,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2期。

②劉京希:《在兩難之間:論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十大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3年第1期。

③原祖傑:《學術期刊在學術共同體建設中的作用》,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

④⑥Dean Keith Simonton,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Todd L. Pittinsky, e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ew Perspectives and Dir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76, 177.

⑤Michael Polanyi, *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7.

⑦Peter Newell, Knowledge, Frames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Climate for Change*, September 2000, p. 40.

⑧⑭朱劍:《數字時代的同行評議:一個有待破解的悖論——以學術期刊匿名審稿制為中心》,成都:《理論與改革》,2023年第5期。

⑨鍾源:《訪談朱劍:回歸學術共同體是學術期刊及其編輯的最好選擇》,“澎湃新聞”,2018年9月7日。

⑩朱劍:《徘徊於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⑪梁念瓊:《當代中國學術期刊的文化生態批判》,湖南湘潭:《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⑫仲偉民、朱劍:《中國高校學報傳統析論——兼論高校學報體制改革的目標與路徑》,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⑬張耀銘:《學術期刊如何提升品牌力》,北京:《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⑭張耀銘:《重建學術公信力和權威性》,《總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25~26頁。

⑮朱劍:《編輯學者化與編輯引領學術:兩樣的賦能,一樣的迷思》,昆明:《昆明學院學報》,2023年第1期。

⑩朱劍：《編輯學者化：何以討論了三十年》，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2期；《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1978—2017年學術期刊史的一個側面》，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⑪⑫劉石：《也談“身份焦慮”與“編輯學者化”》，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3期。

⑬葉娟麗：《編輯學者化：一個不應成為問題的真問題》，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3期。

⑭陳穎：《新時代高品質學術期刊建設與編輯的初心使命》，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

⑮⑯張耀銘：《關於學術期刊生存發展的幾個問題》，長沙：《雲夢學刊》，2013年第4期。

⑰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 12-16.

⑱高自龍：《新時代學術期刊創新引領的五個視域》，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

⑲⑳劉普：《我國學術不端問題的現狀與治理路徑——基於媒體報道的64起學術不端典型案例的分析》，北京：《中國科學基金》，2018年第6期。

㉑㉒仲偉民：《量化評價扼殺人文學術——關於人文學科學術期刊的評價問題》，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3期。

㉓原祖傑：《學術評價的困境與學術期刊的使命》，北

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

㉔沈固朝：《期刊評價、學術評價與引文索引》，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㉕蘇金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體系的構建方向與實踐創新》，北京：《圖書情報工作》，2023年第19期。

㉖張耀銘：《學術期刊高質量發展的新趨勢》，江蘇無錫：《江南大學學報》，2024年第1期。

㉗Mike McGrath,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Journal Editor,” in Deborah Shorleg, Michael Jubb, eds. *The Futur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Facet, 2018, p. 120.

㉘張天祁：《科學界苦同行評議久矣？如何改革？》，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2022年11月14日。

㉙李劍鳴：《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的學術評價》，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㉚原祖傑：《試論信用、倫理與同行評議制度》，成都：《理論與改革》，2023年第5期。

作者簡介：原祖傑，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副理事長，《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原常務副主編。成都 610064

[責任編輯 劉澤生]